

会那么有条理，为何会从头到尾让人挑不出一个错，找不到一个英语口语误。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，宛如印刷体的工整笔迹令人赞叹。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班上的学生，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大加赞赏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他心地厚道，富有同情心，善待他人，奖掖后学。学生若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他会十分挂念，主动予以帮助。他总是为别人而喜，为别人而忧。

慈爱的公公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时光难以倒流，但眼前仍然时时闪现着公公的身

影——他那温和的音容笑貌、儒雅谦恭的风度、善解人意的倾听、自谦自嘲的谈吐、顾全大局的退让、体贴入微的关照、利他的自我忍耐，那体现他博大无私胸襟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……他的人格魅力已融入我的心灵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感动着我，影响着我，促我改进，促我完善。我敬爱亲爱的公公，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！

（原载《国外文学（季刊）》，
2004年第3期）

回忆天翔同志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往事

○张其铨（1950 土木） 储传亨（1950 土木）



郑天翔学长

1953年，天翔同志领导并主持编制北京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，历经五年，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，成为首都第一部规划方案，为北京的建设与发展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尽管时间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，但我们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13年，亲身经

历了这个进程，见证了这段历史。他那刻苦学习、高瞻远瞩，敢于担当的感人事迹，还历历在目，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
理论联系实际 近期与长远结合

1952年底，他从包头市调到北京，先后担任市委常委和秘书长、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。从1953年中开始，市委分工由他领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和建筑施工工作。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，曾先后由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彭真同志主持，1955—1958年期间，天翔同志担任了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。

解放以后，学会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，已经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，正如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的：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。”当时北京面对着

□ 师友情

十分复杂的局面。不仅党内、党外对城市规划有着许多不同意见，而且建设条件很差，基础资料极度匮乏，城市规划技术队伍非常薄弱，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任务之艰巨，对于他也是可想而知。加之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哲学的，对于涉及大量工程技术知识的城市规划，完全是陌生的。为此，他带头刻苦地学习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编辑了13本上百万字的《城市建设参考资料》。他组织人员，选定题目，翻译了大量的资料。当时俄语人才很缺，他就委托公安局组织会俄语的犯人翻译稿件。所有的稿件都要经过他的最终审阅、定稿，才交付印刷。这些资料不仅培养了一批北京城市规划技术队伍，而且影响到全国，不少省市也前来索要。

1953年北京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，施工任务急剧增加，城市规划长期不定，势必影响到当前建设。而制定规划面对的首要问题，就是基础现状资料十分匮乏。连适合做规划的小比例尺地图都没有，不得已只好用老地图缩放拼凑，



2003年11月29日，贺郑天翔同志90岁生日，张其锬（右1）、储传亨（左1）学长和郑天翔同志夫妇合影

做成底图。他组织规划人员，开始一边分析专家已经提出的方案，一边组织全市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现状调查，同时组织中央和市有关部门参与规划工作。1954年即编写出《关于北京市的一些现状资料》，这份资料涉及北京市的自然情况、人口、工业、房屋、市政建设等方方面面。在审稿过程中，他非常认真，提出问题，核实查对。看到其锬同志写的北京市的自然情况，涉及到北京工程地质中的八宝山断裂带，他就要求其锬同志去请教学者，后来访问了北京地质学院杨杰教授才定稿。为了让更多的不熟悉城市规划的领导也能看懂，还要求我们要加上通俗的注释。总之他对工作是非常细致、严格的。

1955年苏联专家到京后，又继续开展更深入的调查。前后延续了四年多，调用上万的人力（仅公共交通流量调查一项，短时间就动用过一万多人），完成了系列的现状调查资料：气象、工程地质、工业、房屋、人口、土地利用、绿化、交通、上水、下水、河湖、电力等十余项，并绘制出现状图。他经常听取调查工作的汇报，并对调查报告亲自进行修改定稿。经中央批准的北京市第一个总体规划方案，就是在这样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。

对于北京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，如水源，他始终高度重视。对于引滦河、引黄河、引长江水等各个方案都进行过研究。1954年底，派出以钟国生为首的考察组，赴内蒙考察引黄河水的可能性，并亲自以市委名义写信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，请求大力支持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。同时还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索取了规划资料，进行研究。对水利部肖秉钧同志1954年提出引长

江水的战略方案也很关注。对引滦河水进京方案，也让钟国生等同志做过细致的研究。因此在总体规划方案中，都为跨流域引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。

对待北京古建筑的保护，市委和他也是十分重视的。如拆除年久失修的朝阳门城楼，是非常慎重的，向中央报告后，经批准后才执行的。对于北京城墙这个敏感问题，毛主席是非常明确，主张要拆除，而市委的态度非常慎重，实际上是拖着没有执行。在1963年夏季河北发生特大洪水，多个水库溃坝，伤亡很严重，毛主席得知有些县城，因城墙未拆而保了平安，就在当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说过，看来城墙不光战争时有用，也可以防水灾，没拆的也可以不拆。但是最后还是他在审查修建北京环城地铁时，决定拆除了。从我们1983年进行的航空遥感调查中，对不同时期航空照片做了分析，也发现“文革”之前，古建筑破坏较轻，而“文革”中，是北京古建筑受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。

当时是处在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，他非常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。同时在学习苏联经验时，又特别强调一定要结合中国和北京的实际。譬如对于道路系统的宽度和天安门广场的规模，苏联专家开始有不同意见，认为太宽、太大。但他坚持与苏联专家沟通，说明情况，最后苏联专家还是赞同了天翔同志的意见。

仅有远景计划还不行。他认为容易让人感到实现规划无从下手。于是组织编制了《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》，并于1954年10月报送中央。1958年也编制了《北京市1958—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》。这在当时编制总体规划的同时，还

编制近期建设规划，还不多见，也是创举。

总之，他是坚持实事求是地既结合北京的实际，又考虑到今后的需求为北京的发展留下空间。他在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，有一段文字充分说明了他的规划思想：“关于城市建设中现在与将来的关系，我们认为，现在的规划事实上要决定首都长远发展的方向。城市布局一经形成，即很难改变。因此，我们不但要从我们这一代人的需要和可能出发，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发展的需要，给后辈子孙留下发展余地。”“我们估计首都人口的总数将来绝不止五百万。把道路留得宽些，主要交通干线的宽度规划为80到120公尺左右（将来也许窄了，但现在似难定得更宽）。在城市的绿化方面，除了把窑坑、窪地、苇塘等不适于建筑的地点规划为人工湖或公园外，还规定每个区都设立区公园，增设各种大小公共绿地，并计划在市区外围和西山建造大防护林带。这样规划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偏宽偏大，但如果现在定的过小过窄过死，将来又觉得居住拥挤、马路过窄、绿地太少时，再要拆房改建就困难更多，投资更大。现在把城市用地留得大些，把道路和绿地留得宽些、多些，将来如果证明用不了这样大、这样宽，可以在分期建设计划中逐步修改。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进可退，比较主动。”实际上，这是他对当时部分党内同志认为北京规划过宽、过大的回答。也充分体现了彭真同志的城市规划的思想：不要束缚后代子孙的手脚，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。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年规划的目标与任务都逐步实现了，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。经中央批

□ 师友情

准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方案，为北京的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否则，哪能有北京现在较好的发展态势和条件！

天翔同志就是善于把中央的方政策和北京的实际结合起来，把北京的近期发展和远景结合起来。他终于带领一批城市规划队伍，完成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。

捍卫北京城市规划

万里同志 1958 年 3 月，从城市建设部调到北京，任北京市委常委、书记处书记，北京副市长。1958 年 6 月市委领导同志分工有所改变，万里同志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。天翔同志分工主管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。当时工业部门同志对全市的规划还不太了解，从当前职工的实际需要考虑得多些，新建和扩建厂都想靠近城区发展。天翔同志因此经常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厂长、党委书记们的思想工作。1958 年，北京第二毛纺厂本来已经选址在宣武区白纸坊，并且已经快开工了。他多次和厂长胡一哉交谈，还是把该厂动员、安置到昌平县城附近建设了。接着又把北京手表厂也安排到昌平县城。1963 年引进日本的维尼纶技术，本来有机化工厂和维尼纶厂都想安排在东郊工业区。有机化工厂生产维尼纶的原料——聚乙烯醇，北京维尼纶是利用原料抽丝，生产成品——维尼纶纤维。这两个厂从工艺上讲，应该布置在一起。而且有机化工厂的原料还要靠北京化工二厂供给。所以日本专家坚持建在一起的意见。这样，三个工厂的建设问题就都纠缠在一起。但天翔同志考虑到北京维尼纶厂耗水量大，大量污水还必须经过处理。所以他

很坚决地决定，把维尼纶厂安排在水源丰富的顺义牛栏山镇附近，既解决耗水量大，又要求单独建污水处理设施。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东郊工业区污水处理的负担，后来的实际效果也是好的。正当北京工业大上的时候，他又及时把污染严重的两个大工厂：大化肥和大电解铝厂停建了。1958 年中，他还决定把 50 多个中小型机修、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搬到远郊县镇，为郊区发展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。这些也都是他为建设卫星城的探索。

规划局李准同志曾经说过：“天翔同志管工业，对我们规划部门太好了，他为工厂选址做了大量的工作。那些厂长党委书记都是中央部门下来的，有些口气也很大。不是天翔同志跟他们做工作，我们真对付不了他们。”实际上，这也是天翔同志在捍卫北京的规划方案。

尊重知识 关爱人才

这是天翔同志一贯的思想，有人曾给他提意见说他爱才，他的回答：“我就是有点爱才。”

在写作《回忆北京十七年》时，他没有忘记那些为北京规划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。特别提到：“梁思成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，学识渊博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长期担任都委会和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，提出过独到的见解。北京设计院著名工程师朱兆雪、杨宽麟，著名的建筑师张镈、杨锡镠、张开济、赵冬日、陈占祥、华揽洪等许多同志……在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上，都作了重要的贡献。”

但他也没有忘记过，他曾经有过失误。就在写此文的过程中，他曾给其锷同志说：

“我当时对梁先生尊重不够。”我们也想过，毛主席1954年对梁先生批评得那么严厉，他作为市委领导，哪能违抗毛主席的指示。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敬淦同志还告诉我们，天翔同志离开北京市到七机部工作之前，专门找到他说明：“批判梁先生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起来，是错误的。”请他们在写北京市规划史料时，要讲清楚。到2001年，他还专门出席了梁思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。这都显示了他对梁思成先生的尊敬和歉意。

对于陈占祥、华揽洪先生的错划为“右派”，他始终很内疚。他说，他们爱国，满腔热血回到祖国参与建设，我们怎么把他们划为“右派”呢？1989年，其锷同志赴巴黎学术考察时，专门去华揽洪先生家，看望了华先生，并向华先生转达了天翔同志的歉意。后来天翔同志认为其锷同志为他办了一件好事，并嘱咐他把《回忆北京十七年》中有关内容，寄给华先生，其锷同志也照办了。接着，他还让其锷同志把《回忆北京十七年》书送给陈占祥先生，亲笔题写，请他指正。陈先生也很大度，表示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认为天翔同志不要太在意了。一次清华大学校庆，天翔同志和陈占祥先生在工字厅不期而遇，他们还和校友们一起合影留念，成为非常珍贵的纪念。他这种严于律己，坚持自我批评的作风是非常难得可贵的。

他对于年轻的城市规划队伍的培养，也是沥尽心血。他多次亲自动笔写报告，向中央要求给北京多分配些城市规划和市政工程的专业大学生。对于刘仁同志意见：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、学理工科的大学生要“归队”，调到规划部门从事城市规划。

他也很支持，照办。1956年初，他亲自向规划委员会的全体干部，传达中央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”的精神，要求响应“向科学进军”号召，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，成为副博士，专家。为了恢复自己的英文学习，他也让其锷同志为他买了英文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当时国内尚无英文版的，最后买到英国共产党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他更多的是用身教带动大家。他要求很严格，有的规划组长汇报工作不得耍赖，他就要求马上停止，告诉他应该如何汇报。他要求组长汇报，就不许别的同志越俎代庖。还要求组内其他同志也都出席，便于互相学习。因此当时一说要向天翔同志汇报工作，大家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，这对大家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。他要求所有苏联专家的谈话、讲课都要做出记录，整理后在内部印发，供大家学习。有一次田惠玲同志说话不注意，和苏联专家产生了分歧。他了解情况后，他没有批评，还表示：“我喜欢这样有自己看法的同志。”

通过他的言传身教，也为北京市培养出一批理论联系实际、学风严谨、思路开阔的城市规划技术队伍。

天翔同志是北京市第一部城市规划方案的领导者、组织者、实施者和捍卫者。在“文革”被关押期间，这是他最艰难的日子，他还在写对北京市城市规划的意见。当他看到天安门广场附近，出现不协调的日本商业广告，还向有关部门提意见……他爱着北京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。天翔同志走了，他是怀着对北京的期盼与关注而走的！我们相信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后起之秀，一定会向天翔同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的！